

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

方勤 胡长春 席奇峰 李晓杨 王玉杰
(湖北 武汉 430077)

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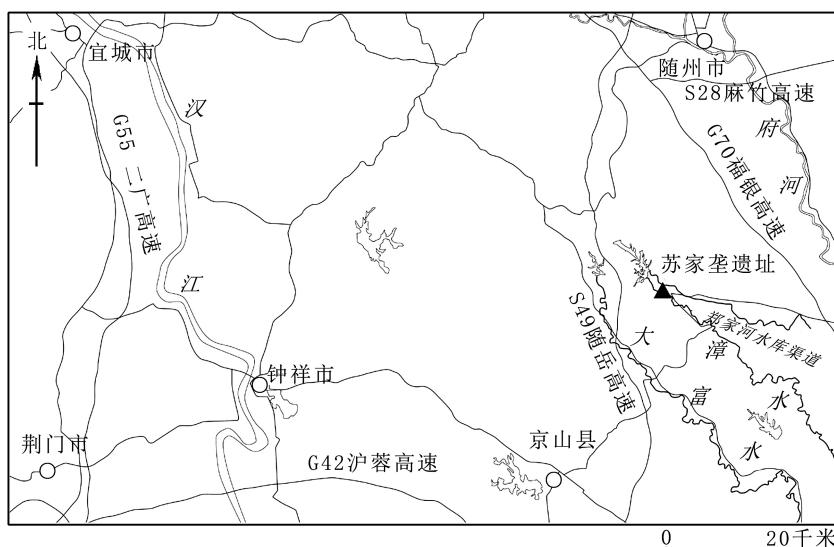
苏家垄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坪坝镇西侧，坐落于漳水的北岸、两条支流交汇的丘陵岗地上(图一)。漳水在今安陆市境内注入涢水(下游称为府河)，涢水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，流经随枣走廊，流域内分布着叶家山墓地、文峰塔墓地、擂鼓墩古墓群等曾国遗迹。

1966年修建水渠时，在苏家垄发现包括9鼎7簋在内的97件青铜器^[1]，鼎、壶等青铜器上有“曾侯仲子旅父”、“曾仲游父”等铭文，这是考古首次发现文献记载的九件列鼎，时代属于两周之际，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。由于这批铜器不是科学考古发掘所得，因此引起学术

界关于9鼎是否出于一座墓葬、墓葬规格是否达到诸侯级别等的讨论。2008年在发现9鼎7簋青铜器群地点以东25米处抢救发掘墓葬1座，出土青铜簋4件，青铜戈2件，车马器1件^[2]。2013年苏家垄墓群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为进一步弄清苏家垄遗存的性质，实现主动性考古工作与课题研究相结合，2014年开始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墓地及其附近区域进行了调查、勘探和发掘，最终确认这是一处包括墓地、居址、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，特别是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，意义重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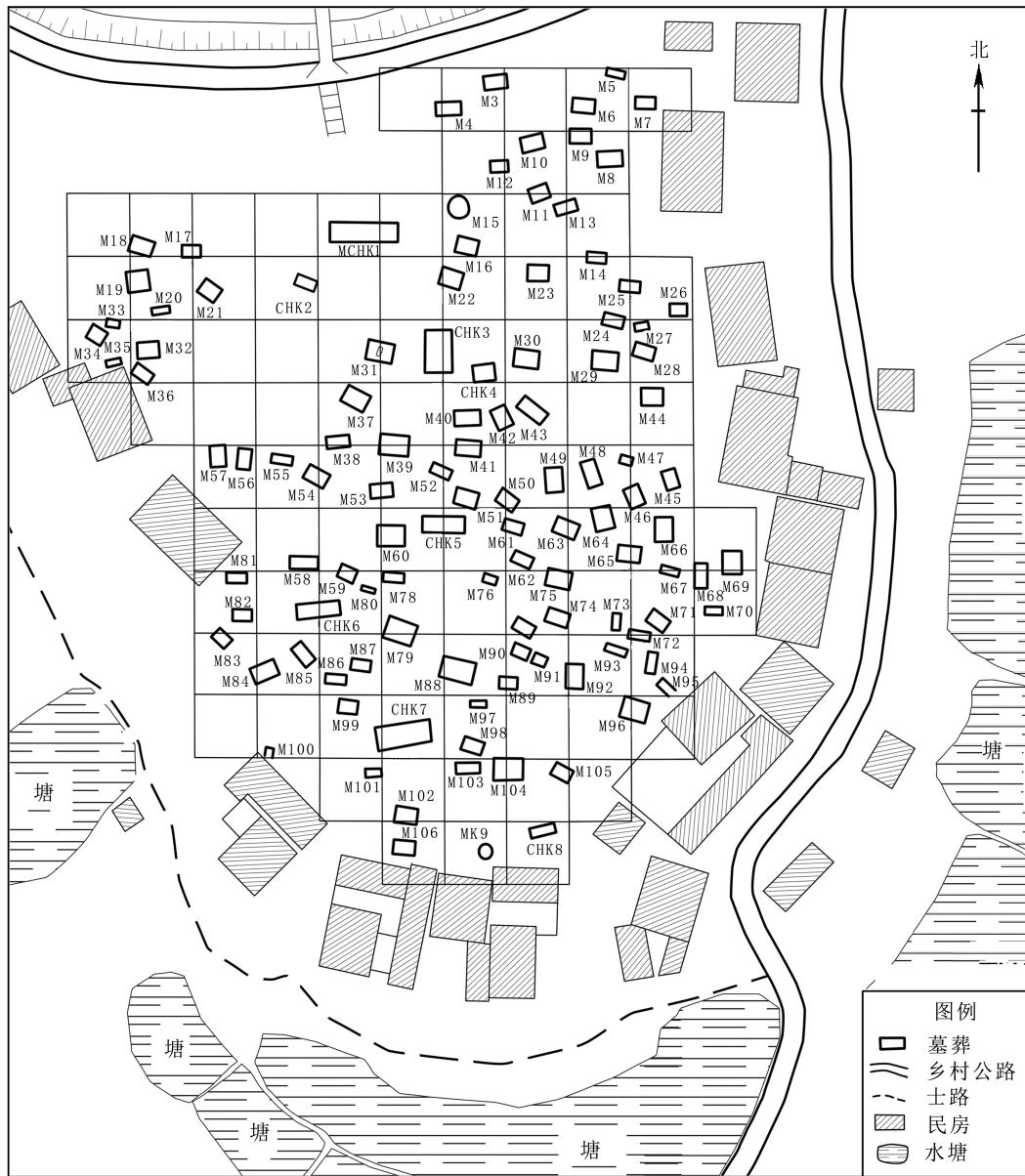
—

2014~2015年对墓地进行了大面积勘探，



图一 苏家垄遗址位置图

作者：方勤、胡长春、席奇峰、李晓杨、王玉杰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。



图二 墓地南区墓葬分布示意图

发现上世纪出土9鼎7簋的沟渠两边南北岗地均分布有墓葬，其中南部岗地探明墓葬106座、车马坑9座（图二）。2015~2017年对南部岗地进行发掘，至目前已清理墓葬101座、车马坑2座（封二），具体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之际。墓葬多为东西向，长度多在3~5米，年代上有由北向南渐晚的趋势，墓葬之间不见打破关系，较大墓葬沿岗地脊顶排列，1966年

清理的九鼎墓M1^[3]以及本次发掘的M60、M79等五鼎规格大墓即从北到南分布在山脊上，小墓则在两侧分布，反映了较为严谨的墓地布局。墓葬保存完好，几乎没有被盗，均为竖穴土坑墓，葬具保存状况不佳，主要为一椁一棺。随葬品多放置在棺椁之间，以青铜器为主，目前已发现青铜礼器500余件。青铜礼器放置有序，组合关系明确。小型墓如M85有鼎

1、甗1、簋1、盘1、匜1。大型墓M79有鼎8、鬲4、甗1、簋4、簋4、壶2、盘1、匜1(图版一、二),8鼎包括升鼎5、附耳鼎3,分别与簋、簠搭配(图版三、四);M88有鼎3、鬲5、甗1、簋4、壶2、盘1、匜1(图版五)及玉器(图版六)等。有铭青铜器多达50余件,其中多篇铭文涉及重要史料。M79出土的鬲簋壶等多件铜器上有铭文“曾伯叡”(见图三,1),墓主人当为“曾伯叡”。M88出土有3鼎4簋,紧邻M79分布,规模、墓向与M79一致,为“曾伯叡”夫人墓。M79、M88两墓各出“曾伯叡”铭文壶2件(图版七),铭文位于壶盖、壶腹内壁,单壶铭文计161字(图三)。4件壶造型一致,铭文完全相同,共计644字,在春秋时期青铜器中极为罕见。壶腹铭文83字(含两重文,图版八),内容释读为:

“唯王八月,初吉庚午,曾伯叡哲聖孔武,孔武元犀,克逖淮夷,余溫恭且忌,余為民父母。惟此壺章,先民之尚。余是祫是則,允顯允異。用其鑄鏐,唯玄其良,自作尊壺,用孝用享于我皇祖,及我文考,用锡(賜)害(匱)眉壽,子孫永寶。”

初步研究,铭文中“哲圣孔武,孔武元犀”,为对曾伯叡品德的赞美之词;“是祫是則,允顯允異”,意指曾伯叡自我勉励,以身作则;“克逖淮夷”表示曾国能够治理淮夷;“温恭且忌,为民父母”,是指曾伯叡性格温和恭敬且有威严,统治一方民众;“用其鑄鏐,唯玄其良,自作尊壺”,说明挑选上好铜料,制作了这件铜壶。

盖部铭文78个字,内容与壶腹基本一致,壶腹首句“唯王八月”比盖铭多一“王”字,另壶腹多最后祝语“子孙永宝”。壶铭中“克逖淮夷”(见图三,2)和M88出土的簋铭中“陔夫人芈克”(图版九、一〇)等都是重要的出土文献资料。墓地北端邻近水渠,清理一座较大型车马坑,葬车7辆。在墓葬发掘过程中对M79、M88青铜礼器进行实验室清理,初步清理出丝绸、黍等若干有机质遗存,M88一件鼎中清理出铜镜一枚(图版一一),保存了诸多重要信息。

墓地发掘的同时,发掘单位对其周边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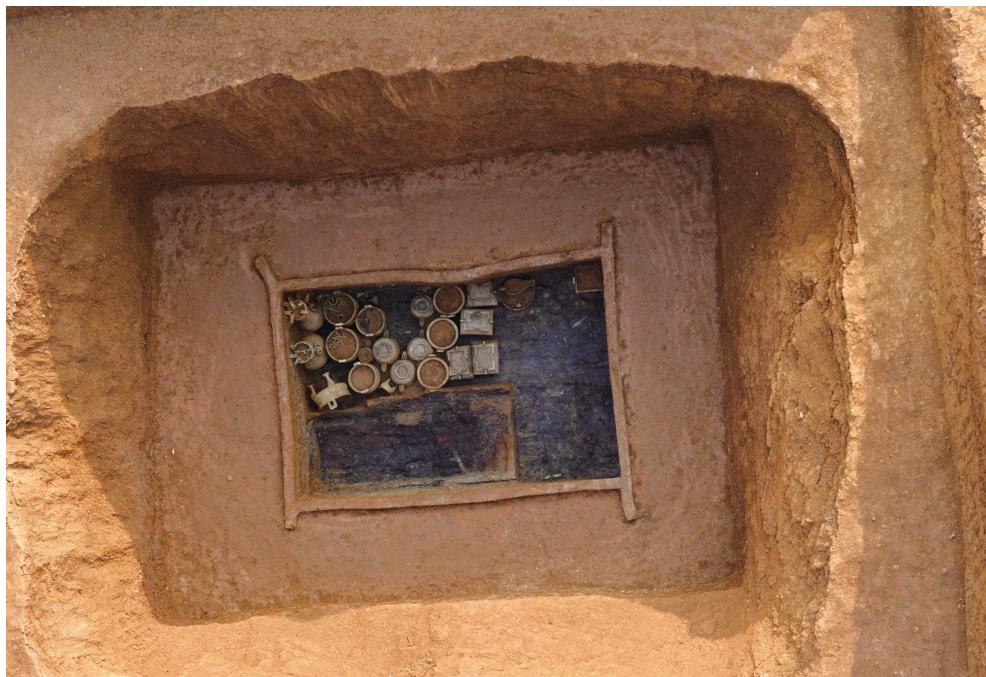
行了结合勘探的区域考古调查,确认该区域是一处以苏家垄墓地为主体,兼有与墓地同期的居址、冶炼遗存的大型遗址,总面积达231万平方米,其中遗址内分布的铜矿炼渣遗迹达75万平方米(图版一二),检测结果与初步研究表明,铜渣主要是当地进行冶炼的炼渣。目前已发现炼铜炉一座(图版一三),炉址上清理出与墓地同时期陶片,可见冶炼遗迹与墓葬同期。遗址内距离炉址1000余米正北方处出土了一块铜锭(图版一四)。

三

苏家垄遗址2015~2017年度考古厘清了墓地的性质与布局,出土的大批带铭重要青铜礼器、发现的与墓地同时期大型曾国居址,以及首次发现的同期大规模曾国冶铜遗存,是研究周王朝经营南方和管理南方矿产资源的重要资料,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

(一)曾伯叡器群与传世的曾伯叡“金道锡行”青铜簋对应,揭示了周王朝管理经营南方及南方铜、锡原料的重大史实。传世曾伯叡青铜簋,早年系陈介祺先生收藏,现存国家博物馆,此次出土曾伯叡铜壶,与之均有“克逖淮夷”等铭文,铭文诸多语气、用词相似,可以确认M79墓主人“曾伯叡”即与传世曾伯叡“金道锡行”簋器主为同一人。这一发现,实证了周王朝早期通过曾国,管理、控制随枣走廊,进而控制淮夷并掌控“金道锡行”铜、锡资源的史实。遗址大面积的冶炼遗存、出土铜锭及厚重的青铜器等,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、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,为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,对探讨春秋时期诸侯国青铜手工业的生产和管理、汉淮与中原地区之间金属资源的流通有着关键的意义。

(二)墓地出土青铜器排列有序、组合清晰,是探讨两周时期器用制度的极佳资料。其中M79出土传统的五鼎四簋以及新兴的三鼎四簋,是春秋早中期之际高等级墓葬流行的多套礼器组合的最早实例,体现了春秋早中期之际礼制的转变。青铜器诸多特征开江汉



图版一 M79 全景

地区春秋初期之先河，曾伯季五鼎风格上承西周晚期、下启春秋之初，为研究楚式升鼎的源流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
(三)苏家垄遗址是与叶家山、郭家庙、文峰塔和擂鼓墩等遗址点并存的曾国重要遗址，这些考古发现建构了传世文献并不明确的曾国，并使之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明晰的诸侯国之一。这处高等级聚落与同时期的郭家庙等曾国遗存并立，显示当时曾国复杂的社会结构。此外，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涉及诸多历史信息，发现的“番”、“黄”、“宋”等铭文提供了研究曾国与诸侯国关系重要史料，尤其是M88墓的“陔夫人芈克”铭文簋，是现今可见较早的反映曾国与早期楚国关系的考古实证。

(四)在墓地北端邻近水渠清理的埋葬7车的车马坑，墓地现有周边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墓葬，结合整个墓地布局，推测其应当是1966年发现的M1祔葬车马坑，这进一步佐证了1966年发现的M1应该是一座大型墓葬。M1出土的“曾侯仲子侯父”铭文九鼎、大型车马坑，以及

规模宏大的聚落等，暗示这里存在作为曾国都城的可能性。曾伯季壶“为民父母”铭文，也显示了‘曾伯季’可能为当时当地的最高统治者。

苏家垄遗址2015~2017年度考古工作是曾国考古主动把墓地发掘和遗址调查勘探相结合，并取得重要收获和突破。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与勘探、发掘出土遗物的实验室清理、重要遗迹的及时保护、多学科综合研究以及考古与大遗址保护规划相结合，是促成苏家垄遗址考古工作成果的基础，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和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充实的条件。

附记：本文为国家文物局十三五课题“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”成果。青铜器铭文为李零、李天虹等先生释读，特致谢忱！

注释：

[1]湖北省博物馆：《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》，《文物》1972年第2期。

[2]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M2发掘简报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1年第2期。

[3]同[2]简报把1966修渠发现九鼎青铜器群的墓葬编号为M1，从其编号。

(责任编辑、校对：陈丽新)



图版二 M79 出土器物(局部)



图版三 M79 出土的鼎簋组合



图版四 M79 出土的鼎簋组合



图版五 M88 出土器物



图版六 M88 出土玉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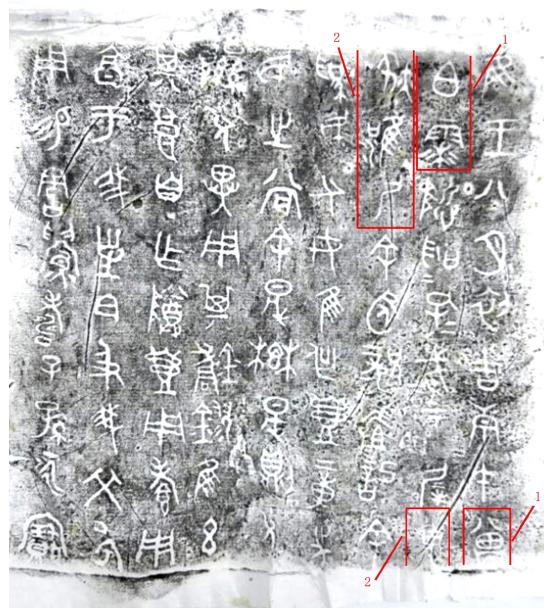
图版一一 M88·2 鼎内出土铜镜



图版八 曾伯叡壶腹铭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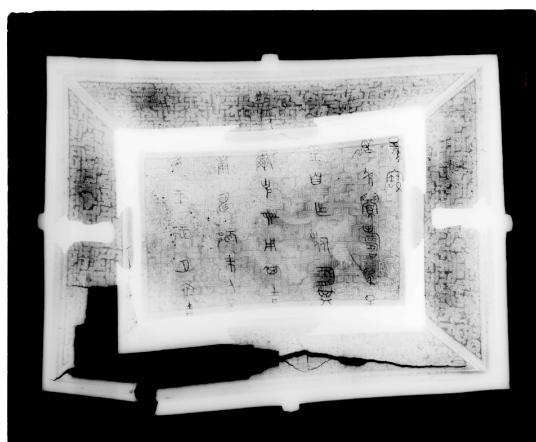
图版七 “曾伯泰”壶



图三 曾伯黍壶铭文拓片



图版九 “陔夫人芈克”簋



图版一〇 “陔夫人芈克”簠铭文 X 光片



图版一二 炼渣遗存



图版一三 炼炉炉基



图版一四 铜錠